

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

葛剑雄 主编

吕思勉讲思想史

Lisimian Jiang Sixiangshi

吕思勉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学问之道，求公例，非求例外。昔人不知各时各地之不同，则无论何事，皆有其不可解之处，而史事悉成例外矣。知之，则事实之形状不同，而其原理则一。汇万殊归一本，而公例斯主。此固凡学问之所同，不独史也。——《史籍与史学》

文化，事极难言。追溯文化之由来，而其所以然之故，弥不易矣。予谓文化者，人类理性之成绩也。人之举措，直情径行者果多；熟思审处，自不少。举措既非偶然，成绩必有可睹；一人然，人人从而效之，万人然，后人率由不越，积久则成为制度，习为风俗。其事不容骤变，而其迹亦不可遽灭。此则所谓文化史者矣。——《中国文化史六讲》

史籍，非一物也。会通众事而得其公例者，可以谓之史学；而不然者，则只史籍。史学缘起颇迟，而史籍之由来，则甚旧也。——《史籍与史学》

其所以然之故，弥不易矣。予谓文化者，人类理性之成绩也。人之举措，直既非偶然，成绩必有可睹；一人然，人人从而效之，万人然，后人率由不越，而其迹亦不可遽灭。此则所谓文化史者矣。——《中国文化史六讲》

一阶级，当其初兴之时，其利害，总是和大多数被压迫的人一致的。及其成功，其取敌对阶级的地位而代之之时，其利害，便和大多数人相反了。官僚阶级取族而代之，即系如此。——《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

同之道，求公例，非求例外。昔人不知各时各地之不同，则无论何事，皆有其不可解之处，而史事悉成例外矣。知之，则事实之形状不同，而其原理则一。汇万殊归一本，而公例斯主。此固凡学问之所同，不独史也。——《史籍与史学》

由来，而其所以然之故，弥不易矣。予谓文化者，人类理性之成绩也。人之举措，直少。举措既非偶然，成绩必有可睹；一人然，人人从而效之，万人然，后人率由不越，不察骤变，而其迹亦不可遽灭。此则所谓文化史者矣。——《中国文化史六讲》

吕思勉讲思想史

Lüsimian Jiang Sixiangshi

吕思勉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思勉讲思想史/吕思勉著.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8. 11

(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葛剑雄主编)

ISBN 978-7-80643-871-8

I. 吕… II. 吕… III. 思想史—研究—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7600 号

书 名 吕思勉讲思想史

著 者 吕思勉

责任编辑 卞 岐 韩凤冉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 邮编 210037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153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43-871-8

定 价 16.00 元

(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总序

葛剑雄

学术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有了前人的成果，后人才能有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前人的成果，后人不得不重复前人的研究，而且未必能达到前人的高度，“广陵绝响”是人类学术史上经常不得不面对的千古遗憾。要是人类的学术研究成果始终能得到传承，人类能取得的进步肯定要大得多。

秦始皇时代，多数儒家经典被付之一炬，或者被禁止传播。博士伏生将《尚书》藏在墙壁间，秦汉之际的战乱过后大部分已经遗失，只剩下二十九篇。伏生就以此为基础，终身传授《尚书》。在他九十余岁时，汉文帝派晁错去他家学习。此时伏生已口齿不清，由他女儿转述才大致完成传授。尽管由于双方所操方言的差异，导致晁错的一些误解，但基本内容还是得以流传。“薪尽火传”，靠的是火种不灭。中华文明能够长盛不衰，并发扬光大，靠的就是一代代火种。

印刷术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书籍的流传，但人为的破坏还是会使得有些书籍从此毁灭，往往使一门学问后继无人。而且，对严谨的学者来说，总会有一些研究的心得或某项具体成果来不及整理成文，或者因种种原因没有发表，只能靠口耳相传。

从孔子杏坛讲学，到现代大学开设的各种课程，讲课一直是传授学

术的重要途径。学者的论著当然应该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主,重在创新;但讲课的目的是向学生传授,应该系统总结某一方面的学术史和全部成果,并不限于教师本人的研究领域和成果。中国的学术传承过程中,相当多的学者毕生从事教学,并没有留下什么个人著作,却使学术的薪火代代相传。而且,以传授学问为目的的讲稿或著作会较多注意受众的接受能力,更适合普及的要求。由于时代所限,这些著作在引文方面经常有不符现代学术规范的现象,甚至有引文错讹之处。本次整理中均未作修改,以存学术著作原貌。

20 世纪是中国学术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时代,中国的现代学科都是在这阶段建立起来的,中国的传统学术也在这阶段实现了现代化转型,或者在现代学科中得到延续。但 20 世纪前期天灾人祸频仍,加上种种学术以外的原因,不少学术成果无法正常传播,有些虽未失传,却长期无人问津。直到近年,还有些自以为颇有发明创新的论著,其实只是由于没有充分了解前人的学术积累而作的无效重复。还有些学术论著虽曾发表,但流传不广,今天更不便查阅,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近年来,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整理和出版(包括重版)名家的讲义、讲稿及普及性的学术论著成为当务之急。凤凰出版社编辑出版这套《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丛书,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相信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目 录

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	1
第一讲	4
第二讲	6
第三讲	9
第四讲	15
第五讲	34
第六讲	39
第七讲	49
第八讲	55
第九讲	69
第十讲	72
中国文化史六讲	79
第一讲 婚姻族制	82
第二讲 户籍阶级	90
第三讲 财产制度	96
第四讲 农工商业	102
第五讲 衣食居处	109
第六讲 交通通信	117
史籍与史学	123
一、史学定义	125
二、史籍溯源	127

三、史学缘起	129
四、史部大略	132
五、史家宗旨今昔异同	138
六、史料范围	143
七、论搜辑	146
八、论考证	148
九、论论史事之法	151
十、史学演进趋势	155

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

讲 一 章

《中国政治思想史》，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上海光华大学所讲，子女翼仁笔记之，而予为之订补。以阅时甚暂，故所讲甚略，特粗引其端而已。虽然，古之所贵乎朋友讲习者，曰讲明；学者于义有所不彻，教者罕譬而喻焉，曰讲贯；既习其数矣，而未能观其会通，故教者为引而信之，触类而长之也。故曰：予非多学而识之，予一以贯之者也。专门之士，穷幽凿险，或非圣人所能为。然覆杯水于堂坳，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况于翻检钞录，又不足以语于曲者邪。抑闻之，古之为政者，必立谏鼓，置谤木，岂不知忠言之逆耳，谗谄面谀之快于心，虽睿智，思虑有所弗能用，虽聪明，耳目有所弗能及，是以用众以自辅，求贤以自鉴，而不蔽于其所亲昵也。若乃将直言极谏与诽谤同科，举国计民生惟党徒之殉，弗思耳矣，亦已焉哉。云南起义前夕自记。

《中国政治思想史》，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上海光华大学所讲，子女翼仁笔记之，而予为之订补。以阅时甚暂，故所讲甚略，特粗引其端而已。虽然，古之所贵乎朋友讲习者，曰讲明；学者于义有所不彻，教者罕譬而喻焉，曰讲贯；既习其数矣，而未能观其会通，故教者为引而信之，触类而长之也。故曰：予非多学而识之，予一以贯之者也。专门之士，穷幽凿险，或非圣人所能为。然覆杯水于堂坳，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况于翻检钞录，又不足以语于曲者邪。抑闻之，古之为政者，必立谏鼓，置谤木，岂不知忠言之逆耳，谗谄面谀之快于心，虽睿智，思虑有所弗能用，虽聪明，耳目有所弗能及，是以用众以自辅，求贤以自鉴，而不蔽于其所亲昵也。若乃将直言极谏与诽谤同科，举国计民生惟党徒之殉，弗思耳矣，亦已焉哉。云南起义前夕自记。

《中国政治思想史》，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上海光华大学所讲，子女翼仁笔记之，而予为之订补。以阅时甚暂，故所讲甚略，特粗引其端而已。虽然，古之所贵乎朋友讲习者，曰讲明；学者于义有所不彻，教者罕譬而喻焉，曰讲贯；既习其数矣，而未能观其会通，故教者为引而信之，触类而长之也。故曰：予非多学而识之，予一以贯之者也。专门之士，穷幽凿险，或非圣人所能为。然覆杯水于堂坳，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况于翻检钞录，又不足以语于曲者邪。抑闻之，古之为政者，必立谏鼓，置谤木，岂不知忠言之逆耳，谗谄面谀之快于心，虽睿智，思虑有所弗能用，虽聪明，耳目有所弗能及，是以用众以自辅，求贤以自鉴，而不蔽于其所亲昵也。若乃将直言极谏与诽谤同科，举国计民生惟党徒之殉，弗思耳矣，亦已焉哉。云南起义前夕自记。

第 一 讲

中国的政治思想史，是颇为难讲的。因为：

（一）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不同。政治制度，是有事实可考的，历代都有记载。记载自然有缺漏，但是一件事实，缺落其一部分，或者中间脱去一节，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自然有人去研究，用考据手段去补足他。政治思想则不然，他是存于人的心里的。有许多政治思想，怕始终没有发表过；即或发表过的，亦不免于佚亡（凡高深的学说，往往与其时的社会不相宜，此等学说不容易发表，即使发表了，亦因其不受大众的注意，或且为其所摧残而易至于灭亡）；此等便都无可稽考。

（二）中国是一个政治发达的国家；而且几千年来，研究学术的人，特别重视政治；关于政治的议论，自然有许多，但都不是什么根本上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一件事情，我们倘然看作问题而加以研究，必先对于这件事情发生了疑问；而疑问是生于比较的。我们都知道：希腊的政治思想，发达得很早。在亚里斯多德时，已经有很明晰的学说了。这就是由于希腊的地小而分裂，以区区之地，分成许多国，各国所行的政体，既然不同，而又时有变迁。留心政治问题的人，自然觉得政治制度的良否，和政治的良否大有关系，而要加以研究了。中国则不然。中国是个大陆之国，地势是平坦而利于统一的。所以其支离破碎，不如希腊之甚。古代的原民族，——即今日所谓汉族——分封之国虽多，所行的政体，大概是一样。其余诸民族自然有两样的，但因其文明程度较低，中原人不大看得起他，因而不屑加以比较研究。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①，最可以代表这种思想、这种趋势。直到后世，还是如此。没有比较，哪里会发生疑问？对于政治，如何会有根本上的研究呢？因此，中国关于政治的史料虽多，大都系对于实际政务的意见——如法律当如何改订、货币当如何厘定之类——此等学说，若一一列举，则将不胜其烦，而其人对于政治思想依旧没有明了。研究中国的政治思想，非将一个思想家的学说，加以综合，因其实际的议论而看出其政

^① 见《论语·八佾》。

治上的根本主张来不可。这是谈何容易的事情？

凡思想总是离不开环境的，所以要讲政治思想，必先明白其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事实，而政治制度和事实的变迁，就自然可以影响到政治思想而划分其时期。我们根据于这种眼光，把中国的政治思想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 自上古至战国 这是中国的社会组织发生一个很大的变迁的时期，自政治上言之，则为由部落至封建（指实行分封制的政体），由封建至统一。

第二期 自秦至唐 秦汉是中国初由封建而入于统一的时期。封建之世（指实行分封制的时代）不适宜的制度，在此时期中，逐渐凋谢；统一之世所需要的制度，在此时期中，逐渐发生；逐渐发生的制度，自然又有不适宜的，不免酿成病态，政治家所研究的，就集中于此等问题。

第三期 自宋至清中叶 第二期中所发生的病象，到此渐觉深刻了，大家的注意，自然更切，而其研究也渐深，往往能触及根本问题。而这时期之中，民族问题也特别严重。实际上，民族问题在秦汉时代已经发生，当“五胡乱华”之时，已经很严重了，但是人们的思想，往往较事实要落后些，彼时还不曾感觉它十分严重，到宋朝以后，却不容人们不感觉了。要御侮先要自己整饬，因此，因为对外问题的严重，也引起了内部改革的问题。

第四期 自清中叶至现代 这是中国和欧洲人接触而一切思想都大起变化的时期。政治思想当然不是例外。

第二讲

要讲很复杂的政治思想，我们必须先有一个把握。这个把握是什么？就是把几千年来的政治思想先综括之而作一鸟瞰，得一个大概的观念。然后，持之以研究烦杂的材料——这是为入手之初方便起见，自然不是研究之后不许修正的。本此眼光而立论，我敢说中国的政治思想可以(1) 进取(2) 保守两派概括之。

为什么会有这两派呢？为什么不会有第三派？又为什么不会只剩了一派？

这是因为社会的本身同时有两种需要，而这两派各代表其一种。所以，这两派是都有其确实的根据，都有其正当而充足的理由的。

这话怎样说呢？说到这句话，我们先要问一问：国家和社会到底是合一的还是分离的，就是国家和社会到底是一件东西还是两件东西。

这个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

(1) 有许多人民还没有能够组织国家，然而我们不能说他没有社会。

(2) 有许多国家已经灭亡了，然而其社会依然存在。

(3) 所谓社会，其界限是和国家不合的，一个国家之中可以包含许多社会，而一个社会也可以跨据许多国家。

据此社会和国家确系两物。未有国家之前先有社会，社会是不能一天没有的。人永远离不开社会的，出乎社会之外而能生存的人，我们简直不能想像，而国家则是社会发展到某程度应于需要而生的。我们现在固然很需要国家，我们非极力保存我们的国家、扩张我们的国家不可。然而，国家并不是我们终极的目的。照我们现在的希求而逐渐向上，国家终究是要消灭的。这不是我一人的私言，古今中外的哲人怀抱此等思想的，不知凡几。不过这件事情是很艰难，其路途很遥远，我们现在不但没有能达到目的，甚且连达到目的最好的途径都还没有发见罢了。然而，事在人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并非真有甚么天神鉴观下民哀矜之而从其所欲，不过全人类真正的欲望，其实是相同的。虽然因环境的不良而暂时隐蔽著，及其环境一变，真正的欲望马上就要发露

出来。而且环境的改易,也并非天然的变迁,实际上就是人因其为真正欲望的障碍,而在无形中大家各不相知地把其改造之。故环境改造得一分,人的真正欲望实现的可能程度便高一分,而去其实现之境也就接近一分。如此努力向前,我敢相信路途虽然遥远,终有达到目的的一天。然则国家在现在虽然很需要,到将来终有消灭的一天的。所谓政治,就是国家所做的事情,国家既是社会发展到某程度应运而生的东西,政治自然也是社会发展到某程度应运而生的现象。

然则在社会发展的历程中,为什么要生出国家这种东西,产生出政治这一种现象来呢?须知人类所组织的社会,有两心交战,正和我们一个人的心有善恶两念交战一样。这两条心是什么?便是(一)公心(二)私心。

公心,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个人好,就希望大家好,甚而至于为著人家不恤牺牲自己。因此,就发生出许多好的制度和好的事实——代表公意的制度和事实来。私心,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不但不肯损己以利人,还要损人以利己。因此,便生出许多坏的制度和坏的事实来。社会进化到某程度,私心发生了,就有抱著公心的人出来和他抵抗。这所谓抱著私心和抱著公心,并不是指具体的人。同是一个人,对于这件事怀抱著公心,对于那件事可以怀抱著私心。在这时期这地方怀抱著私心,换一个时期一个地方又可以怀抱著公心。所以,与其说是两个人,不如说是两个阶级。坏的阶级把好的阶级完全消灭,这件事是不能想像的,因为如此人类就要灭绝了,而且这不是人类的本性,当然也不会有这一回事。好的阶级完全把坏的阶级消灭,还非现在所能。在现在,事实上是如此的一个政府,一方面代表全社会的公意,一方面也代表其阶级的私意,这是古今中外凡有政府都是如此的,不过两者的成分或多或少罢了。

因为社会上先有了所谓恶意,然后有政治出来矫正他。所以矛盾不消灭,政治也不消灭。而政治实际上没有单代表公心的,总兼代表着私心,他所以跃居治者之地位,就有一部分为的是要达其私意之故。既已居于治者的地位,自然更可将这种私心实现。所以政治的本身也是能造成矛盾的,政治不消灭,矛盾也不消灭。

人类的公心是无时而或绝的,总想把这社会弄得很好。因此,在任

何时代任何地方，总要想上进。但是，因为私心未能绝灭之，故任何事情都不容易办好，而且不办事则已，一办事往往因此而又造出一种坏来。人的性质是各有所偏的，有人富于热烈的感情，对于现状深恶痛绝，这种人自然容易发见现状之坏，研究改革之方，而于改革之难达目的，及其因此而反生弊端，却较少顾虑。如此便成为进取派，而其性质和它相反的，就自然成为保守派。人的性质是有此两种，所以古往今来的政治思想都可以这两派括之。至于哪一派的势力较强，自然和其时代也有关系。在这一种观念之下，去了解中国的政治思想，我以为是较容易的。

以上所说的话是很抽象的，以下用具体的话来证明它。

第三讲

上古到战国，划分为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时期，前文已经说过了。这一个时期之内，政治思想的背景，是怎样呢？

这一个时代，在政治上，可以说是从部落进于封建，从封建进于统一的时代。

人类最初的组织，大概是依据血统的。但是到后来，就渐渐地从血统的联结，进于地域的联结了，这就成为部落。

部落的生活，大概是渔猎、游牧、农耕三种。从前的人，都说人类进化的程序，是从渔猎到游牧，游牧到农耕的，其实也不尽然。依现在社会学家所考究：大抵山林川泽之地，多从渔猎径进于农耕；平原旷莽之区，则从渔猎进化到畜牧。至于进化而成为国家，则游牧农耕两种人民，关系最大。

渔猎民族，需要广大的土地，才能养活少数的人口，所以其人数不能甚多；而文明程度也较低；与游牧民族战争时，多不免于败北。

农耕民族，文明程度是最高的；其人口也较多。和游牧民族战争，本来可得胜利。但因其性质爱好和平，而又安土重迁，不能兴师远征；所以游牧民族来侵犯时，虽可把他击退，总不能扫穴犁庭。而游牧民族，败则易于遁逃；及其强盛之时，又可以集合起来去侵略他人，农耕民族，总不免有时为其所乘。所以以斗争论，游牧民族，对于渔猎民族和农耕民族，都是很有利的。但是渔猎民族，文明程度本低，加以败北之后，可以遁迹山林，游牧民族，倒也无如之何。农耕民族，却和土地的关系密切了，宁受压迫而不愿遁逃。游牧民族战胜时，便可以强制他服从，勒令他纳贡。进一步，还可以侵入其部落之内，而与之同居；强制其为自己服役。如此，一个部落之内，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两个阶级对立；征服者治人而食于人，被征服者治于人而食人；就成为国家的起源了。

以上所述，是现代社会学家的成说，从我国古史上研究，似乎也是相合的。古代相传的帝王，事迹较有可考的，是巢、燧、羲、农。有巢氏教民构木为巢，燧人氏教民取火熟食，其为渔猎时代的酋长，显而易见。

伏羲氏，因为相传有“驯伏牺牲”之说，大家就都认他为游牧时代的酋长。其实这全是望文生义的。伏羲二字，乃“下伏而化之”之意，见于《尚书大传》。其事迹，则《易经》的《系辞传》，称其作网罟以佃以渔。《尸子》亦说：燧人氏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伏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其为渔猎时代的酋长，也显而易见。伏羲氏之后是神农氏，则名义上，事迹上，都昭然无疑，是农耕时代的酋长了。其根据之地：有巢氏治石楼山，在琅琊南；燧人氏出暘谷，分九河；伏羲氏都陈；神农氏都鲁；都在今河南山东黄河以南。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则在今河北涿县。大约古代：山东半岛之地，有一个从渔猎进化到农耕的民族，便是巢燧羲农；而黄帝则为河北游牧之族。阪泉涿鹿之战，便是这个农耕民族为游牧民族所征服的事迹。

社会的内部，其初是荡荡平平，毫无阶级的。但是男妇和老幼的区别，是很早就存在的。前者是基于两性的分工；后者则由于知识技艺的传授，以及遇事的谋略，临事的指挥；经验丰富的人，总处于重要的地位。所以在浅演的社会里，虽然还行著女系，而掌握实权的，也以男子为多。至于年老的人，则其地位尤为优越。社会愈进步，分工的作用愈显著，处于特别地位的人，自然愈形重要。如此，专门指挥统率的人，权力逐渐增大，就成为君的起源。其偏于保存智识的人，则成为僧侣。凡此等，都是一个团体之内，特殊阶级之所以形成。然而总不如用兵力征服的关系来得大。

这一个部落，征服那一个部落，其初是用勒令进贡的方法，去剥削他的。至于被征服部落内部的情形，则丝毫不管。中国从黄族征服了炎族以后，直到夏禹之世，对于被征服者，还有这种情形。所以夏后氏对于农民所收的租税称为贡，和这一国献给那一国的礼物，名称相同。其方法，则系按几年收获的平均额，向他征取。至于丰年可以多取而不取，以致谷物不免浪费；凶年不能足额而强要足额，以致人民受累；他是丝毫不管的。可见这时候，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还没有融合。到殷周时代，情形就不同了。殷代收税之法名为助，是强制人民代耕公田的。周代收税的法子名为彻，是田亩不分公私，而国家按其所入，取其十分之一。可见这时候，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已合并成一个社会了。

古代农耕的社会，其内部，本来是有很良好的规则的。凡榨取，必